

孙子兵法

(春秋) 孙武著

主编 赵安郎

百战韬略



青森文化

孙子兵法 百战韬略

赵安郎

主编

书名：孙子兵法百战韬略

作者：孙武

主编：赵安郎

副主编：顾汝中 乔天亿 曹广明 洪正友 韩峰 程鹏炜

编辑：青森文化编辑组

电子书出版：红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湾仔道133号卓凌中心11楼

出版计划查询电话：(852) 2540 7517

电邮：editor@red-publish.com

网址：<http://www.red-publish.com>

出版日期：2024年12月

图书分类：人文社科 / 军事 / 孙子兵法与兵书

电子书国际书号：978-988-8868-90-2

注家簡介

趙本學

本書注譯由明代軍事家趙本學所寫的《趙注孫子》。

他是《孫子兵法》眾多注家的其中之一，雖是身居草澤的隱居之士，卻因其憂國恤民之志，不願看到孫子的兵學思想失傳，而盡心注解孫子的兵法理論，創作出一代著作。

主編簡介

趙安郎

1949年生于江苏，“老三届”知青。1978年考入南京农业大学，1984年赴意大利深造，拓展国际视野。著有《孙子兵法百战韬略》《三国演义计谋大破解》等畅销书，以独特视角深受读者喜爱。《孙子兵法百战韬略》1992年出版，三十年后推出电子书版，致力于让经典内容在互联网时代广为流传。



內容簡介

本書按照《孫子兵法》的篇目而分為十三個章節，講述多種孫子的謀略和戰術，並在每章引錄《孫子兵法》原文的每一句，附上注釋和譯文，逐一解釋《趙注孫子》中每一段對《孫子兵法》的注解，輔以編者的補充說明及實例。

本書特色

- 本書除了有《孫子兵法》原文的注釋和譯文，還有《趙注孫子》的詳細注解，更有編者的補說。
- 本書內容詳實，編排有條理，論點清晰。
- 本書每章開首均附有精美的情景插圖，總共十三張。

專業推薦

- 原文短短不過六千字，卻衍生出無數注解本和相關書籍。
- 流傳二千五百年，依然是古今中外諸多實業家推崇有加的不敗經典。
- 從戰爭背後準備到正式面對戰場皆一應俱全，雖是教打仗的兵書卻也有效阻止戰爭發生。
- 當中的智慧和真理不但在戰場上適用，在商場競爭、職場工作和人際關係上亦非常實用。
- 應用書中策略解決問題，定能在現實生活上披荊斬棘。
- 滿滿的乾貨，每字每句皆是重點。
- 一本在手，成功不是夢。

每章結構

【趙注釋題】 趙本學對每篇的釋題，簡述篇章內容。

【孫子曰】 引錄孫子原文，原汁原味細讀原句。

【簡釋】 注釋文言字詞，方便閱讀原文。

【譯文】 將文言文譯成白話文，輕鬆讀懂原文。

【趙注】 詳細解釋趙本學的注解，深入理解孫子的兵學思想。

【引類】 舉實例說明孫子的兵法理論，將複雜的概念簡單化。

【補說】 編者對照原文補充說明背後故事，包括歷史背景、學術分析、資料總結等。

精華內容

《孫子兵法》七大謀略

- 1、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瞭解自己，瞭解敵人，勝利必然屬於你。
- 2、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
——隱藏自己實力，洞察敵方底細。
- 3、 「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百戰百勝固然顯示了高明的戰鬥才能，但不用武力而使敵人放棄抵抗更稱得上高明。
- 4、 「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以前善於用兵的人，先創造條件，等待敵人給予的機會。使自己不被戰勝的同時，等待戰勝敵人的時機。
- 5、 「夫兵形如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士兵的狀態如同水流，水流往低處。用兵也是如此，應該避開強大的敵人，攻擊敵方防守較弱的地方，消滅敵人。
- 6、 「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洞察敵情，因敵而變。
- 7、 「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
——想要士兵英勇殺敵，就需要激起他們憤怒的情緒。想要奪取敵軍的資源，則要記得獎賞士兵。

目录

[答客问](#)

[一、计篇](#)

[二、作战篇](#)

[三、谋攻篇](#)

[四、形篇](#)

[五、势篇](#)

[六、虚实篇](#)

[七、军争篇](#)

[八、九变篇](#)

[九、行军篇](#)

[十、地形篇](#)

[十一、九地篇](#)

[十二、火攻篇](#)

[十三、用间篇](#)

答客问

(代序)

客：现在有关《孙子兵法》的书出得不少，你又凑什么热闹？

答：大地任花放，才蔚成灿烂景色，只要自具其形，自有其色，自馥其香，开得象一朵花儿；

丛林听鸟鸣，才汇成和谐乐章，只要自展歌喉，自扬其声，自具丰韵，叫得让大伙耐听；

《孙子》凭研读，才出现学苑盛事，唯须自有见解，自成其说，自具特色，读起来能给人以启迪。

历代注《孙子》者，共约200家；注本流传的，仅七十余家；著名的注家，只有十多家。他们是：

汉魏的曹操；

唐代的李筌、杜佑、杜牧、王哲；

宋代的张预、贾林、梅尧臣、陈皞、孟氏、何延锡、郑友贤；

明代的刘寅、李贽、赵本学；

清代的邓廷罗、顾福棠、黄巩。

赵本学是世所公认的十余名家之一。

“凑”就是聚合，聚合方显出热闹的气氛。我们对《赵注孙子》进行校注、翻译，并加上补说，是对促进孙子学说的研究与流传略尽绵薄之力，这是名副其实的“凑合、凑合”。

问：赵本学是怎样的注家？

答：他没有戎马一生，扫荡群雄，横槊赋诗，慨当以慷，以政治家、军事家的睿智首注孙子的曹操那样的功业；

他没有青楼梦好，豆蔻词工，而磨洗沉戟，评点战史，以文人的气质、诗家的才情来注孙子的杜牧那样的声名；

他只是身居草泽，不求闻达，却怀世虑民志在安邦，以平民的身份、匹夫的责任来解孙子的黄石公一样的一位“隐君子”。

缀合散见于兵书序跋的零星材料，我们对他只有如下一些印象：

他澹泊功名，长期隐居，终生无仕，《明史》无传；

他曾潜心研究《易经》，并用它指导精读兵书，解注《孙子》；

他曾致力于研究阵法，著成《韬铃内外篇》，发展了《孙子》以来的阵法理论；

他曾尽心于注解《孙子》，并传授给抗倭名将俞大猷，促成了俞的抗倭大业；

他也曾虽年七十而心雄万夫，日出暮归，以兵法指点乡民，推动了家乡福建晋江的抗倭斗争。

我们把这样一位有丰厚学识，丰富实践、深邃见解的人，把他的兵法理论完整地介绍给大家，觉得是一种应尽的责任。

问：《赵注孙子》的版本流传情况如何？你们依据的是什么版本？

答：一个智者可以自愿长期隐居，但他的思想却不会因此而流传阻滞；

赵本学尽管自己不求闻达，然而他的《赵注孙子》却流传在极广阔的时空。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赵本学已经辞世，他的嫡传弟子俞大猷痛感“终先生之身，无有知者（《韬铃内外篇》、《孙子十三篇注解》）二书藏于名山而不行于世”，因而把它们连同他自己的《剑经》合为《续武经备要》刊刻行世；

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赵注孙子》重版，有《重刻续武经备要》问世。

这一版本流行甚广，曾东渡扶桑流传日本。

日本德川幕府时代，刊出了由修业堂窪田清音校刻的中文本《赵注孙子》；

后来，文久癸亥年（1863），日本重版《赵注孙子》，该书成为日本兵书中最常见的本子。

这个本子又返回中国。民国十七年（1928）上海石印出版了由窪田清音校刻的《赵注孙子》。

我们依据的就是这个版本。

问：《赵注孙子》有什么特点？

答：兵书是理论，最应说理清晰，论点鲜明，持之有据。日本昌平学儒员若山拯于文久癸亥年撰《刻〈赵注孙子〉引》，称它“解义简明，引类的确，诸注家盖莫能及。”有一位赵本学的同乡叫郭惟贤，他在《〈孙子书〉序》中评介道：“所校者字句有解，解有引类，解

之使意显，引之使事核。”这些评述足证《赵注孙子》是一部理论完备、自具特色的兵书。

兵书不是纸上谈兵，文字游戏，它必须有极强的指导性。赵本学把它传给俞大猷，俞大猷用它指导抗倭寇。俞大猷的成功，就是《赵注孙子》在实践上的胜利。赵本学也曾用自己的理论去指导家乡的抗倭斗争，其业绩虽史无明载，但明代福建晋江一带抗倭的胜利，必定包含着赵本学军事理论上的成功。这些史实足证《赵注孙子》是一部指导性极强的兵书。

问：《赵注孙子》在理论上的指导性，可以详细谈谈吗？

答：孙子论“兵”，“舍事言理”、“词约文丰”，提出的是一般性指导原则；

虚舟作注，援事析理，事核理明，证实的是原则的指导作用。

《赵注孙子》，受启迪于《孙子》而又发展了《孙子》。

他在《势篇》解“奇正”，引用元代大学者吴莱的文学理论：

“作文如用兵，有正有奇。正者，法度部伍分明也；奇者，不为法度所缚，千变万化。”

他在《虚实篇》释“虚实”，借助著名医学辨证施治的原则：

“虚实二字，用兵者以之因形而胜，医者以之视病而投药，故医者以之视病而投药，故医者之于人，诊其脉，观其色，察其声，问其证；用兵者之于敌，策之，作之，形之，角之，所以然者，皆欲求知其虚实而已。”

他在《地形篇》阐述“爱而不能令”一节，援引了富家教子无方的教训为喻：

“徒欲爱之、厚之，而不能使之、治之，则如富家骄惰之子，狎恩恃爱，犯法背逆，是亦不可用之以战，必也恩威两重，不苛亦不弛，斯得其道。”

《赵注孙子》的这些论述，表明他已经注意到，孙子的战略战术原则可以越出军事范畴，渗入于许多不同的领域，发挥着普遍的指导作用。

事实上，孙子的慎战思想，全胜主张，伐谋的策略，先胜的理论，致人的方针，任势的原则，奇正的灵活变化，虚实的巧妙运用，还有因粮于敌的补给原则，适时点火的助攻战略，相敌、料敌的侦察手段，用间、索情的知彼措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诸如企业管理、生产经营、外交斗争、商业谈判、体育竞赛、文化艺术、学校教育、医药卫生等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就体现了它的指导性。

问：改革开放，商品经济大潮席卷全国，你能就《孙子》在商品经济中的指导作用谈谈吗？

答：历史是一面殷鉴，现实是历史的继承和发展。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

“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

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史记》3259页）

白圭的经营活动中，可以看到孙子治军制胜的原则得到灵活运用：

“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致人而不致于人”、“兵之所加，如以礲投卵者，虚实是也”。

“与同事僮仆同苦乐”——“上下同欲者胜”、“视卒如爱子”、“视卒如婴儿”。

“趋时若猛兽鸷鸟”——“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

“是故其智不定与权变”——“用利而制其权”。

“仁而不能取予”——“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

此外还讲到经营者自身的修养，这与孙子提倡的将之“五德”是相同的，也是智、信、仁、勇、严。

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很长，崇本（农业）抑末（商业）的观念根深蒂固，《赵注孙子》不可能涉及这些内容，所以我们略加补说，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我们坚信，古人尚且知道在经营活动中自觉运用孙子兵法的原则，思想不断解放的今人更能够在商品经济生活中创造性地运用。

问：孙子兵法为什么会具有如此普遍的指导意义呢？

答：研究兵法有两大目的，无论治军，还是克敌，对内或是对外，都是为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因此孙子的主要用兵原则都体现出朴素的辩证精神。这就是它具有广泛适应性与指导性的根本原因。

用兵有一大前提，就是“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知敌”、“索情”靠的是“顺详敌之意”、“必取于人”。这种体察敌情的方法闪烁着唯物认识论的光辉。这就决定它在实际生活中必然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孙武从自身的实践与前人的经验中概括出指导性原则，赵本学以后人的实践去阐述这些原则的指导意义。原著与注解，归纳与演绎，深具逻辑力量的论述，必然容纳更丰富的内涵，在更广阔的时空中获得更广泛的外延。

问：怎么读这部书才好？

答：读书为了明理，读书为了求知。

博学之，广积而可薄发。

慎思之，慎思方有真知。

明辨之，分析可辨真伪。

第一是源源本本读书。读了“经文”，再读“注解”，再读“引类”；读了引类，再读注解，再读经文：以“引类”喻“解”，以“解”解“经”。

第二是反反复复思考，运用演绎推理，理论联系实际。

第三是仔仔细细辨析，孙子的书体现着唯物的认识论，贯串着朴素的辩证法，我们读它应当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必须拿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武器。

一句话：“放出眼光，运用脑髓，自己去拿。”（鲁迅：《拿来主义》）

问：怎么运用书中的观点？

答：读书时，主动把兵书的原则与本职工作的特点结合起来思考分析，寻找贯串其间的本质联系；

运用中，勇于并善于把上述思考的结论去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补充、完善、发展。

不是泥古不化，而是古为今用；

不是照搬照抄，而是活学活用。

问：你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预祝你们赢得读者。

答：谢谢。

我们水平不高，疏漏难免，祈请不吝赐教。

一，始计篇



开篇论述战争的决策过程，强调了战争准备的重要性，提出了五事七计的概念，即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以及七个用于判断胜负的因素。

一、计篇

曹操说：“计，就是选拔将领，估量敌方实力，估计战场广狭，预料士兵强弱，估测战场的远近与险易，在谋划中对这些加以分析，核计。”概括论述了战前必须对决定战争胜负的各项基本条件进行评估，从而预测战果，为作出战略决策提供依据。

【赵注释题】

“始计者，说的是战争准备阶段，应先审视自己、估量敌人，从而预测胜负的可能性。能在谋划中预见胜利，然后才能在战场上获胜；能在决策上有胜利的把握，然后才能在战场上取胜。如果分析考察不够成熟，而以自己的短处去对付别人的长处，那不用交战就注定失败了。”所以孙子把“始计”放在兵书的第一篇。

《计篇》分析考察的有五个方面：君道、天时、地利、将领的素质、将领的执法情况。这五方面，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条件。首先在谋划时分析这五方面的条件都无不利之处，接着就选择将领来承担重任、具体实施。将领选定后，还须对外制造一些假象来辅佐战略计划的实施。作战的根本方针与具体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密，战争的指导策略和具体实施方案都安排得相当周备，那作战胜利就不言而喻了。

以上仅是概括的分析，如果只得人和，而天时、地利或失其一，也不能打胜仗。得了天时、地利，若指挥与谋略二者缺一，还是不能制胜。这不正是说明用兵的难处吗？后代喜欢研究兵法的人，常说用兵

容易，常常说：“我善于摆兵布阵，我善于指挥战斗”，这正说明他们缺乏自知之明。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简释】

兵 本为兵器，引申为士兵、军队、战争、战策、战略等，这里泛指战争。

国之大事 《左传》成公十三年：“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地、道，都应从抽象意义来理解，说的是战争密切关系到军民的生死与国家的存亡。

不可不察 察，这里指慎重周密地观察、分析、研究。

【译文】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密切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是不能不慎重周密地观察、分析、研究的。

【赵注】

（战争）是关系到宗庙社稷的，所以是国家的大事。这是首篇，特意把“计”放在开头。《孙子》在开卷就强调“计”的重要，这是希望君主与将领们一定要格外重视战争谋略。

【补说】

战争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只是它赖以生存的条件还在，就应该研究它、熟悉它，而研究战争又必须从“计”开始。

南唐后主李煜，面对着日趋强大、时刻觊觎江南的周，不去悉心研究军事，采取应变措施，却依旧在金陵的小朝廷内填词赋诗，终至于被

俘、亡国。当他万般无奈，以阶下囚的身份，痛惜“几曾识干戈”时，已是悔之晚矣。一个君主不熟悉战争，这对国家、对民众、对祖先、对自身会产生怎样的恶果，实在是不能没有清醒认识的。

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简注】

经之以五 赵注本为“经之以五事”，今从汉简本。经，杜牧注为“度”，相当于现在的分析、预测。五（事）指下文的“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

校之以计 校，与“较”相通，较量、比较。计，指下文“主孰有道”等七个方面，与五（事）相当。

索其情 分析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预测战争胜负的趋势。

【译文】

因此，必须通过对敌我双方五个方面的分析，七种情况的比较，来预测战争胜负的趋势。

【赵注】

出兵前，应当就道、天、地、将、法五个主要方面的情况，比较敌我双方，从而预卜胜负的趋势：五个方面都占优势的，就可预见必胜；五个方面都赶不上敌方的，则可预见必败。

【补说】

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春天，齐国派大军袭击鲁国，庄公预备迎战，曹刿为此特意去会见庄公。他首先问：靠什么可打胜这一仗？当庄公说到一切诉讼无论案情大小，虽然不能调查清楚作出十分准确的

裁决，可总是慎重处理，做到合情合理时，曹刿高兴地说：“对，这是尽心尽力为老百姓办好事啊，凭这一点，就可以打赢这一仗。”这就是战前“索其情”，预卜胜负。后来齐鲁两军会战长勺，鲁国终以弱胜强，完全证明曹刿的判断是正确的。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简释】

道 张预注：“施恩于民，取信于民”。“道”即为君之道，凡政治清明，能取得民心的，就是有“道”。

天 天时。自然的时序及阴晴寒暑的变化。

地 地利。战略上的有利地形、地势。

将 将领。

法 法制。

【译文】

（这五个方面）指的是：一、君主之道；二、时令气候；三、地形与地势；四、将领的素质修养；五、组织与纪律。

【赵注】

这是五个方面的总纲。有道的君主，天是会助祐的，所以“天”次于“道”；不利的地形地势，人是可以避开的，但天时是避不了的，所以“地”次于“天”；将领的智勇及将兵之道是可以学的，而避开不利的地形并不那么容易，所以“将”次于“地”；有了高明的将领，就会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所以“法”次于“将”。

【补说】

孙子把“道”放在这五方面的首位，说明他特别重视战争中的人心向背。这是孙子以前一些有识之士的共识。鲁桓公十一年（公元前701年）蒲骚之战（楚与陨在今湖北应城县西北的一次战争）中，楚将莫敖担心兵力不足，建议向楚王请求增兵，而斗廉说：“军队克敌制胜靠的是内部团结，不是靠兵多。”他还援引了周武王在牧野之战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败殷军，靠的就是君主有道、上下同心的史实来加以证明。莫敖被说服了。后来，果然打败了陨国的军队。又经过吴起、孟轲等人的完善和发展，明确而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是实行仁道的理想结果。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谗也。

【简释】

令民与上同意 让百姓与国君有统一意愿。

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谗也 不谗也，据汉简本校改。谗，可解作“违”，相背的意思，这里指与君主有二心。

【译文】

君主之道，说的是务求政治清明，让百姓和君主有统一的意愿，从而能够与君主同生死而不怀二心。

【赵注】

能够让百姓体察其意愿、服从其命令，与其共患难，至死不离其左右的，就是有道的君主。或许有人说，古来用兵所仰仗的，也不外这些。孙子的论述，大体与他们相吻合，而我认为“道”有王道和霸道之分：那提倡节省用度，爱护百姓，根据农时季节来安排劳役；提倡

与百姓同好恶；提倡减轻刑罚，减少赋税；提倡重视学校教育，反复申述孝悌主义的，就是“王道”。生活在王道社会里的百姓，定能与君主同心同德，尊敬君主、亲近长官，如同子弟卫护父兄，手与脚保护脑袋和眼睛一样，与他们同生死，这样的百姓打起仗来，还有什么可怕的呢？那提倡向百姓心里灌输仁义的言辞，用小恩小惠来取悦民意，给战士的家属以优厚的待遇，及时地奖赏有功之人，对战死者表示哀悼，对受伤者进行慰问，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这就是“霸道”。生活在霸道社会里的百姓，欢愉喜悦，勇于任事，与君主同仇敌忾，以进击而死为光荣，以退却保命为耻辱，同样能与君主同生死，而不怕任何危险。《孙子》的学说充满了复杂多端的变化，他所说的道，大约是王道霸道兼而有之。

【补说】

“令民与上同意”这个战略思想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启迪了后来人。《吴子·图国》就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它说：“国内不和（统一、团结），不可以出兵；军队内部，官兵之间不和，不可以出阵；兵阵内部各部分之间不和，不可以作战；战争中行动不和（协调），不可以决战决胜。”

孙武在《谋政》篇还提出过“上下同欲者，胜”的论断，这是“令民与上同意”的发展。既应该是“下”同于“上”，也应该包括“上”同于“众”。这个“与众同欲”的观点，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左传·成公六年（公元前585年）》载：楚国袭击郑国，晋国派栾武子救援，楚军回师，晋军乘机入侵蔡国，楚军来救蔡，两军在桑隧相峙。这时有人劝栾武子袭击楚军，但栾武子听了三位参谋的建议回师国内。事后有人对栾武子说：“圣人能够与众人同欲，因而成就事业，

你为什么不听众人的建议？你的参谋有十一个人，反对出兵的却只有三个人呀！”《商书》说“三人占，从二人”，这是因为这时两个人也是多数！这就很有一点主张决策中少数服从多数的意味了。高明的将领善于采纳下面的意见，如此，“上下同欲”就有了具体的内容了，这样做不是更有利于团结统一么？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

【简释】

阴阳 指昼与夜、晴与阴雨的气象变化。

寒暑 指严冬与酷暑的气温变化。

时制 季节与节气的更迭。

【译文】

天时，指的是昼夜、晴雨、严冬酷暑、季节和节气的变化。

【赵注】

阴阳，是就天象而言的。不仅指天时的孤虚旺相，而是凡可以应验战争胜负的星、云、风、雨的变化都囊括其中。寒暑，是就时令说的。这二者对于作战，有适宜也有不适宜的地方，在不适宜作战的时候硬要兴兵，那就会失去天时的助力。有人说“甲子日不能兴兵”，但是周武王在那一天出兵打败了纣王；有人说“岁星在东井不能兴兵”，但汉高祖在那一天出兵灭亡了秦国。可见阴阳天象在战争中不足以依凭。《尉繚子》也说，天官关于时日宜忌的种种规定，明智的将领是不依循的，只有不熟谙战争的将领才拘泥这些。为什么孙子反而要就此对敌我双方加以比较呢？我认为，以顺应天道民心之师来讨伐违背

天道民心的军队，以仁义之师来讨伐暴虐的军队，本来就占有“人和”这个必胜的因素，所以这叫做“造命”。如果地形地势不利，双方君主的德行也差不多，不能超过对方，而只仗着强大的兵力，采取军事行动与对方结怨，那么天时、阴阳怎么不可畏呢？《尉繚子》的论述是为了告诫主帅：在两军对垒的时候，不要由于时日不吉而迟疑，使军心动摇。但是如果军队尚未结集，刚开始在庙堂中筹划，由于发现天时不顺，而中止谋划，不是很好吗？这就证明孙子的论述终究是不能忽视的。

【补说】

唐代诗人杜牧也曾注过《孙子》，并且熟知许多战例，曾以诗来评析战争得失。他的《赤壁》“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就是把战争的胜负归因于天时——周瑜用火攻的那天刮的是冬季少有的东南风。

另《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秦、晋殽之战前，晋国的主将大夫先轸说过：“秦国不听蹇叔的话，为了满足贪欲。劳师动众，这正是天赐给我们的好机会。机会不可错失，敌人不能放跑。放跑了敌人，后患无穷，违背了天意，一定不吉利。我们必须出击秦军！”孙子是一定熟悉这段历史的，但他并没有把这里所说的“天”——一种机遇，归纳在他所说的“天”里，而只赋予“天”以阴阳、寒暑、时制的内涵，可见孙子论战更注重实际存在的自然条件。

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简释】

高下 据汉简本补。地势的高低。

远近 路程的远近。

险易 地势的险要、地形的平坦与否。

广狭 战场地域的宽广与狭窄。

死生 据《十一家注孙子》补。可攻或可守、进退方便的地形叫生地；难攻或难守、进退困难的地形叫死地。

【译文】

地，指的是地势的高低，路程的远近，地势的险要、地形的平坦与否、战场的宽广、狭窄，是生地还是死地等地理条件。

【赵注】

凡是军队经过的道路、宿营地、战场，都叫“地”。这里所说的八种情况，只不过介绍个大概，详细情况见《行军》、《地形》、《九地》各篇。张预说过：知远近，就能够正确判定是迂回进攻还是抄直奔袭；知险易，就能够明确行军作战宜用车骑还是徒走；知广狭，就能够正确估算投入兵力的多寡；知死生，就能够决定是撤退还是进击。

【补说】

西汉贾谊《过秦论》概括秦并六国的历史说：“六国曾经凭借十倍于秦的土地，百万的军队，攻打函谷关，进攻秦国。秦人开关迎战，但是九国的联合部队，杜口裹足不敢前进。秦人没有花费一矢一镞，而天下的诸侯却已是困顿不堪了。”秦兼并天下的战争全部在函谷关以东进行，诸侯的军队从未进入秦的国门，这主要原因之一，恐怕就是秦占有函谷关的地利。在六国的将军们（包括吴起、孙臆、廉颇、赵奢等著名军事家）眼里，函谷关高险狭窄，远离本土，是进退艰难、

凶多吉少的“死地”，而在秦人的手里，则是一个“生地”，一个足以制胜的地形条件。秦统一天下，函谷关的有利地形，应该说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简释】

智 将领的筹画指挥才能。

信 对士卒的赏罚上有信用。

仁 爱护、体贴士卒。

勇 行动勇敢、指挥果断。

严 纪律严明、执法严肃。

【译文】

将，指的就是将领必须具有足智多谋、对士卒赏罚有信、对部属爱护体贴、作风勇敢果断、执行军纪严明等良好的素养。

【赵注】

能洞悉人的心理、感情，洞察事物的细微末节，欺诈骗不了、谗言蒙不了，复杂的变化能应付裕如，善于把坏事变为好事：这些就显出将领的“智”；对勇敢杀敌的士卒给予重赏，对畏缩退怯的进行重罚，奖赏不偏重于亲信，惩罚不回避权贵：这就是将领的“信”；能体察他人的饥渴，与他人同甘共苦，以真心体贴病员，以真情抚慰伤兵：这就是将领应有的仁慈；遇有战机就立即出击，碰上敌人就敢打善拼，破敌阵他一定身先士卒，受围困他一定带头冲出，面对危难而毫不畏惧，战斗失利但决不屈服：这就是将领应有的勇气；军队内部事

务合于规范，号令统一，三军敬畏将领但不畏惧敌人，坚决执行将令却不因君主的诏令而改变，使敌人只能观望而不敢接战，士兵可以战死但决不屈服：这正是将领治军严明的结果。

具备了这“五德”，才可以作大将。

【补说】

将领的“五德”，以智为先。最重要的是将领的指挥才能，君主选将也是着重于智。智体现在其他四德之中。很难想象，一个信、仁、勇、严的大将却不是智者。

我们且看两个战例，具体认识将军之智的关键作用。《左传·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齐鲁两军在长勺会战，曹刿参与指挥，他善于抓住战机，从而大败齐军。他先是按兵不动，任凭齐军击鼓进攻，直到齐军三次进攻后，精力消耗，士气低落了，才命令出击，以逸待劳，一举打败齐军。接着他看到齐军的军旗已经东倒西歪、车辙也乱了，判定齐军在溃退，于是又下令追击，结果大获全胜。这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防御战的胜利，充分体现将领的指挥才能的需要。再如公元前283年，燕军连下齐国70余城，情势危急。就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破格提拔的齐国大将田单，临危受命，他利用和扩大敌人的内部矛盾，一步步削弱敌人，壮大自己，最后以“火牛阵”的战法出奇制胜，大败燕军，收复了失地。田单确实有临危不惧、虽败不挫、被围必出的大勇和从容应变、转祸为福的大智。在预卜战争胜负时，必须充分考虑这一因素。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简释】

曲制 军队内部的组织、编制、管理等方面的制度。

官道 军队内部各级将吏的职责，各机构的职能等方面的制度。

主用 军需供给、军费管理等方面的制度。

【译文】

法制，指的是军队内部的组织、编制与管理，将吏的职责、机构的职能，军需的供给与管理。

【赵注】

古代军队内部组织的规定是：五人为“伍”，五十人为“队”，两“队”为“曲”，两“曲”为“官”，两“官”为“部”，两“部”为“校”。“曲制、官道”所说的大约就是这种编“伍”的原则。实施军事行动，把按这种编伍的原则组建军队放在第一位。考察敌我双方着重采用的编伍原则，战争的胜负就自然很清楚了。张贲说：“部曲有一定的制度，职责有一定的规定，从而各自发挥作用。”这种解释无损孙子的原意。杜牧说：“‘曲’，就是对编制有具体规定；‘制’，就是对金、鼓、旌旗等号令有明确规定；‘官’，指的是偏裨将校序列各有其责；‘道’，军营和兵阵的开合各有其通道；‘主’，管理仓库、饲养马牛等有专人负责；‘用’，车马器械等军需有专人供给。”这些解说虽未必合乎孙子的原意，但总体上仍不失为行军用兵所必须注意的事项，所以一并介绍出来。

【补说】

法，着重讲的是军内严密的组织与严明的纪律，这是对军队进行严格的管理、教育、训练的结果，而这又会转化为战斗力。所以在考察分析战争胜负的因素时，必然少不了它。

正因为“法”的重要，所以历来治军都强调军中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公元前570年，晋悼公练兵时，他的弟弟杨干违犯军纪，执掌军法的中军司马魏绛就杀掉杨干的驭手以示惩罚，悼公却特意提拔魏绛以示赞许。由此可见，“主用”恐怕还是指各种职能部门都能充分发挥各自作用。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简释】

知 深刻的了解。

【译文】

凡是属于这五个方面的情况，将领都不能不作深刻了解。充分了解这些情况就能打胜仗，而不了解这些情况就必不能打胜。

【赵注】

能根据这五个方面既能考察对方，又能对照自己，这就是真正了解它在决定战争胜负上的意义了。大约这五个方面经常为古人提到，所以只要不是聋子都听说过。但是，人有智愚之分，对这五个方面有重视和轻视之分，所以理解上有很大差异。

【补说】

《汉简本》“经之以五，校之以计”从句式上看，是“互文”，意思是说从五个方面对敌我双方进行考察分析，然后作出比较，并以比较的结果来判定战争胜负的趋势。上面已经对“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进行阐述，下面还将继续论证。可见孙武对战前的“经、校”是如何重视的了。由于“计”是“经、校”的前提，而“经、

校”的目的在于预卜战果，所以“计”就成了战前最基础的准备工作，难怪它被放在全部兵法之首了。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

【译文】

所以要通过对双方面各种情况的考察分析，并据此加以比较，从而来预测战争胜负。

【赵注】

由此向下，解释“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用了一个“曰”，表示心与口对话，是“计而校之”的具体分析。

主孰有道？

【译文】

哪一方的君主是有道明君，能得民心？

【赵注】

敬畏天命、勤于民政，任用贤才，尊重亲长，有汉高祖、汉光武帝的气度，有唐太宗、周世宗的谋略，这就是有道的君主。纲纪败坏、政治昏乱、忌害贤臣、暴虐民众，象王莽、曹操一样窃取君位，发动对别国的无理入侵，这样就是无道的君主。“有道”对“无道”用兵，就叫“讨”、叫“诛”，所率领的军队叫“官兵”，所举的旗帜叫“义旗”，有的是必胜的命运。若“无道”对“有道”用兵，这就叫“逆”，叫“乱”，叫“虏”，叫“贼”，有的只能是必败的命运。预卜胜负哪有不先考察君主是否有道呢？可见胜负的根子主要通向君主。

【引类——举例】

韩信同刘邦分析天下大势，谈到项羽的为人，说：“项羽大喝一声，上千的人都被吓倒，但他不能任用贤将，只是匹夫之勇；项王对人恭敬，说话和气，访苦问疾，甚至流着眼泪把自己的东西分给别人享用，但对应该受封的有功之臣，把官印摸得失去棱角还舍不得授权给人家，这仅是‘妇人之仁’；项王虽已称霸天下，诸侯皆服称臣，他不因势利便占据关中要害地区，却在彭城建都，违背义帝与诸将的先约，封自己的亲信为王，引起诸将愤懑不平，背信弃义，放逐义帝，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百姓只是为他积威所胁迫，但心里不愿归附，实际上他已失去人心，所以他的强大只是表面现象，是容易被削弱的。而大王您进入武关以来，秋毫无犯，废除秦朝的严刑峻法，又与民约法三章，关中父老个个都愿大王在秦称王，如果大王举兵东征，只凭大王一纸檄文，便可平定三秦。”这是韩信评论比较两方面的“主”来预测楚汉相争的结局。

【补说】

“主孰有道”所述实际是个战争性质、作战双方国内民心向背、双方的外部关系等问题。而这些又都是以君主是否有道来体现的。君主的一言一行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稍一不慎即贻误全局。且春秋无义战，诸侯之间尔虞我诈，外部关系极不稳定，衡量君主有道与否的主要标准，必然是国内的民心向背。周武王伐纣，在牧野有一篇著名的誓辞，他说：“现在殷纣王昏庸极了，不祭祀祖先，不办理朝政，连叔父与兄弟的劝告都不听，收容四方的坏人来残害百姓……我要代表天帝来惩罚他！”拥有六七十万大军的无道君主终于败在只有六七万士兵的武王手里，就是因为他已失去了民心，由大批奴隶和俘虏组编

的军队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斗力，更何况临阵倒戈，加速了纣的灭亡。所以后来孟子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到了极点，连自己的父母兄弟都要背弃他；多助到了极点，天下人都会归顺他。所以有道君主凭着天下人归顺的军队去攻打父母兄弟都背弃的军队，不打则已，一打必胜。”牧野之战，纣王的大败与武王的全胜是孟子这段论述的历史依据，而孟子的论断又可作为对孙子“主孰有道”的具体阐述。

将孰有能？

【简释】

能 即智、信、仁、勇、严五个方面的治军才干。

【译文】

哪一方将领更有才干？

【赵注】

“智”足以正确地估计敌情；“信”足以团结士卒；“仁”足以招揽贤才；“勇”足以在军中倡导果敢的作风；“严”足以使军队的内部严肃紧张。这五个方面才干俱全的，就可以称得上是有能之将。有的将领偏听偏信、黯于事理、拘于成法、碍于时日宜忌，行动常错失良机，这就是智慧不足；有的将领浅陋骄躁、主张不定、号令反覆无常，这就是信用不够；有的将领凶狠残酷，刻薄暴虐，不得人心，这就是缺少仁爱；有的将领软弱畏怯、行动迟疑，这就是缺乏勇气；有的将领骄横放纵，懈怠懒惰，荒废军务，这就是缺乏严肃。上述五个方面只要沾有一点，都是无能之将。以有能之将对付无能之将，就如同孙臆暗算庞涓，孔明智擒孟获，只有胜利而不会失败；以无能之将

对付有能之将，就如同龙且碰上了韩信，赵括遇到了白起，只有失败而不会胜利。这样，战争胜败怎不关系到主帅呢？

【引类——补注】

三国时代，魏国的谋士贾诩曾对曹丕说：“要攻战取胜，必需重视用兵的权变，巩固皇帝的千秋大业必定要崇尚德化，您顺应天时登基，对士卒关心备至，如果再用仁政来安抚天下以待时机，天下是不难平定的。吴蜀虽小，但蜀国有崇山峻岭作屏障，吴国有长江天险。刘备雄才大略，诸葛亮善于治国；孙权懂得虚实变化，陆逊熟悉军情。他们据有险要的地形，江湖上拥有强大的水军。因此想算计他们是很难的事。用兵的原则，必先有必胜的形势才能开战，这样行动才不会有任何疏漏。我估计我们的将臣没有足够的权谋、完备的对策，虽然可仰仗陛下的天威去进攻，但无战必胜、攻必取的形势。”曹丕求功心切，没有采纳贾诩的意见，贸然发动江陵之战，最后魏国以惨败而告终。这说明从交战两方的将领的才能可以预测战争胜负的趋势。

【补说】

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一个智、信、仁、勇、严诸方面都占着优势的将领，对于打赢一场战争实在是关键，难怪燕昭王高筑黄金台，广求能将；萧何月下追韩信，不让流失人才。乐毅不负重托，一举攻下齐国七十余城；韩信深孚厚望，为最终战胜项羽立下不朽战功。

诱敌深入，逼庞涓自杀的孙臆之智；七擒孟获、竭诚待人的诸葛亮之信；亲吮疮脓，与士兵同甘苦的吴起之仁；龙城扬威，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李广之勇；挥泪斩马稷的诸葛亮治军之严，在孙子之后有大量的史实继续为他的英明论断补充论据。充分肯定将领在战争中的关键作

用，这是唯物的观点，它已为历史所证实，现实和未来必将继续使它充实完善，因为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这样的观点是不可移易的。

天地孰得？

【译文】

哪一方能够占有天时地利方面的优势？

【赵注】

国内无水旱虫雹等自然灾害和危及政权的意外事变。有福星庇祐着它，这就叫得天时；占据了敌国的上游，地形险要，固若金汤，这就叫得地利。

【引类——举例】

十六国时期南凉国国王秃发傉檀准备进攻北凉国沮渠蒙逊，太史令景保劝谏说：“……近年来天象经常混乱，风雨霜露都与季节不符，这种天时应该注重坚守，进攻他人很难奏效，只有修行养德、闭门思过，方可国泰民安。”傉檀大怒，把景保锁起来，悍然出兵。蒙逊正面抵挡，傉檀大败，这是傉檀不顾天时之弊而招致失败。

曹操扫平北方后，沿长江东下，进攻东吴。群臣惊慌失措，周瑜却胸有成竹地对孙权说：“曹操舍鞍马之利，却用水军与我们争高下，用舟楫并非他所长，况现正值寒冬季节，战马缺乏草料，士卒徒涉于江湖、沼泽之间，水土不服，多数得病，这些都是用兵的大忌，曹操偏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盲目进军。将军要捉曹操，就要趁此良机，请拨军三万进驻夏口，定为将军击败他们！”孙权令周瑜刘备联合共同对付曹操，火烧赤壁，从而大败曹军，这是曹操未占天时而遭至失败。

马援讨伐武陵蛮夷，有两条道路可以进入武陵地区。从壶头进，虽路近而水势险恶；从充道进，路虽远却地势平坦。马援认为从远路进攻要耗费粮草，且贻误战机，宁愿冒险走近路，卡住武陵咽喉要地，于是驻兵壶头。武陵蛮夷早已扼守关隘，占领高地。由于水流湍急，汉军兵船难以前进，又适逢酷暑，士兵多染瘟疫而死，马援也染病卧床。汉兵只得在岸边凿洞蔽荫。武陵蛮夷登高据险，击鼓呐喊助威。马援抱病视察军情，手下随从为他的壮举而感动得涕泪横流。尽管如此，马援仍未能逃脱不明天时地利的利弊而招致惨败的结局。

【补说】

孙子说的“天”包括阴阳、寒暑、时制，阴阳指的是昼与夜、晴与雨等的变化，这是唯物的，至于后来的注家把起于汉代的“天人感应”的“天象”也纳入到“天”的范畴中来，这实际是往孙子的学说中塞糟粕。赵注中也掺杂着这样的糟粕。

另外，对战争前途的预测，比较的是敌我双方谁更多地占有天时地利，而战争中完全凭将领的智慧去合理地应用天时地利。所以“天地孰得”的根本还在于将，因而它的次序在“将孰有能”之后。这是孙子更注重战争诸因素中的人——尤其是决策指挥的将领的才干与作用。

法令孰行？

【译文】

哪一方能够更严格执行法规、法令？

【赵注】

不下令前进就不敢擅自前进，不下令后退就不敢擅自后退；将士死不离战鼓，御手死不离辔头，全体将吏死不离职守，大夫死不离战斗行列。这就是法令得到了严格的执行。

【引类——举例】

唐朝中叶，韦云起为防御突厥兵进攻契丹，启民可汗二万兵士由他调遣。韦云起把他们分为二十个营，四路营盘各距一里，不准混杂，听到鼓声立即行动，角声一起，立即停止，除公务需要外不得在营中跑马。三令五申后，下令出发，军中有违将令者，杀。由于韦云起治军严整，威振四方。突厥将领前来拜会时，都胆战心惊，跪着走路，不敢抬头视听。后来韦云起终于立下赫赫战功。这说明韦云起有令必行，有禁必止，为夺取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唐天宝年间，封常清担任高仙芝的留后使，高仙芝乳母的儿子郑德铨已成为威震三军的郎将。有一次封常清出巡归营，诸将都到门前恭迎，而郑德铨却策马飞奔，冲撞了封常清。封常清命随从引郑德铨路经几道门到大厅，每跨一道门槛时，郑德铨都探问缘由，封常清厉声说：“虽然我出身低微，中丞却对我充分信任，让我担任留后使，你这小小的郎将为何如此无礼？！”突然大声呵斥：“来人呵！拖出去重责六十军棍，乱棍打死，以正军纪！”高仙芝的乳母和妻子在门前痛哭求情告饶，无效，只得飞报高仙芝。高仙芝赶来查看，惊叫“已被打死了”。但封常清却神态自若，一言不发，没有任何谢罪的表现。从此军中对他人人敬佩，个个畏惧。这是封常清法不阿贵，执法必严。

【补说】

类似封常清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比如司马穰苴杀监军，杀君主派来的持节使者。杀庄贾是由于他不遵守时间，杀使者是由于他违背了“在军营中不得骑马快跑”的规定。郑德铨所犯的是后一种，军中驰马，冲撞了留后使。其实这两个史实的背后还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封常清、司马穰苴的身分低微，不为权贵尊重，这势必危及令行禁止的威严。这“杀猴儿给公鸡看”，不只是法不阿权，执法必严，恐怕还应该看作是治军之智。从维护统治阶级根本的利益出发，采用这种方法断然处置一些尾大不掉甚至足以坏事误国的权臣，统治者也只能默忍。敢于这样做的司马穰苴和封常清们还真要有一点勇气呢！

法，绝不是孤立的，它集中反映着将领的智与勇，对君主对事业的忠，以及对士卒的信。有这样严格的将领的一方，能不在战争中占优势吗？

兵众孰强？

【译文】

哪一方武器装备更精良，后勤保障更充分？

【赵注】

骁勇善战，骑马射箭战术精良，阵地巩固如同高山屹立不可侵犯，冲锋突击如同大火燎原势不可挡，这就叫作“强”。

【引类——举例】

晋武帝时，马隆讨伐凉州差戎树机的时候，招募专门能从腰部引发六十钧弩机的人入伍，并当场树靶测试，从早上到中午选用三千五百人，亲自为他们到兵库挑选兵器。后西渡温水，树机用上万的人马前来阻击，马隆的士兵所到之处箭无虚发，敌人纷纷应弦而倒。马隆大

军转战千里，攻必克、战必取，很快就平定了凉州一带。这是马隆擅用强兵取胜的战例。

【补说】

赵注与现代通行注本有明显的差异，一是侧重于士兵本身素质强，另一则是侧重于物质装备强。后者认为“士卒孰练”说的就是士兵的素质，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其战斗力必然很强，而物质装备又是战争所必不可少的，所以从物质上说；而前者以为兵众的“强”与“练（训练有素）”是两个方面的，因而割裂开来，这似乎不尽确当。

士卒孰练？

【译文】

哪一方士卒训练有素，更具战斗力？

【赵注】

兵阵中开合进退有明确的规范，车战追逐与面对面的搏击中，动作符合作战要求，就象身体使用臂膀，臂膀使用指头，能够屈伸自如，这就是“练”。

【引类——举例】

唐代宗、德宗时的大将李抱真按户籍登记壮丁，从三十人当中挑选一个，并发给弓箭，命他们隔月一次练习骑射。年终举行大规模比赛。李抱真亲自按名册检查鉴定，赏优罚劣，连续三年，练出的都是精兵强将。适逢李希烈、李纳相继叛乱，李抱真凭着几个州的地盘与叛军抗衡，敌军闻风丧胆，一溃千里。这是李抱真善于训练士卒的结果。

【补说】

赵本学注《孙子》是在承平之世，正如苏轼上《教战守策》一样，目的在于提醒世人防患于未然，所以他着眼于平时的军训，所举实例也是体现有备无患。这就与把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看法有一定距离了。

赏罚孰明？

【译文】

哪一方赏罚公正严明？

【赵注】

记功授奖有明确规定，纠正过错必须付诸行动。奖赏不错过时机，惩罚必须罪有应得。应当奖赏的即使是仇人怨家也必须按规定给予奖励，应当处罚的虽然是亲者爱者也决不放过。这就叫“明”。

文中所称“孰”，都是以自己这一方对敌方而言的。就如所谓“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所述。旧说认为上面所说的为“七计”，我认为所说的“强”、“练”、“明”，治军无方的做不到，孙子如此详细论说，是想让人们弄清楚罢了，哪里在“五事”之外另有所谓“七计”呀！

【引类——举例】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光弼大战史思明时，有个部将勇猛无比，手持长矛直取史思明，刺穿史乘坐的马腹，又刺倒几个贼兵。与此同时，也有人不战而退。李光弼召见那个部将，赏赐给他五百匹丝绢，对那些不战自退的人一律斩首。这是李光弼赏罚分明。

吾以此知胜负矣。

【译文】

我依据这些方面的比较来预知战争的胜负。

【赵注】

以上所说的是把敌我双方五个方面的情况加以比较，这样一比，谁胜谁负就可以作出判断了。

【补说】

前面说了五个方面，这里又说了七个方面。前后两部分“道、天、地、将、法”与“道、将、天地、法令行、兵众强、士卒练、赏罚明”历来认为是对应互补的，只是后一部分对“法”阐述得具体而详细，这当然是有道理的。而我认为既分开来说，就有分的道理。前面“经之以五”是先对自己这一方面作考察衡量，这是根本，所以用陈述句式，介绍考察内容。后面的“较之以计”是对敌我双方作比较，所以采用的是比较句式“……孰……”。而又因比较的重点是战争的主体——军队自身的素质，所以在比较了“道”、“将”、“天时”之后，详细比较了双方的法令执行、兵众强弱、士卒训练、赏罚分明等情况。这样，前后以“五（事）”、“（七）计”分说，既有两部分内容的互补，又体现了实际施行时的程序先后。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简注】

将听吾计 将，音jiāng，如果。如果听从我的谋略。

【译文】

如果听从我的谋略，用兵必能得胜，我就将他留下；如果不能听从我的谋略，用兵必然失败，我就要他离去。

【赵注】

将，指的是全体偏将。说的是主帅在庙堂中所作的考察分析比较预测已经得出结论，然后选拔诸将以承担各项使命。那智勇兼优又能听从我的计谋，任用他可以保证必胜的，就是贤才干将，那就留下来用；如果智勇都属下乘，不能听从我的计谋，任用他难以保证不败的，就是不才之将，那就让他早点儿离开。

张预说：将，语气助词，说的是君主如果听从我所陈述的计谋来用兵作战，就必然胜利，我就留在这里；如果不听从我所陈述的计谋来用兵打仗，就必然失败，我就离开这里到别的国家去。用这番话来激吴王，以求吴王任用他。

另有人说，这番话用意是不需要偏将来参与他的谋画。

【补说】

“将”怎么解释？是将（jiàng）——偏将？还是将（jiāng）——如果？各有各的理由。平生戎马的曹操在这里注释说：“不能定计则退去之”。他是把“将”当作名词的。“庙算”之后，关于战争的策略已经决定，以后的事就该由“将”来具体执行了，所以接着应该选将。而衡量“将”的首要标准当然是看他能否忠实执行“计”而克敌制胜，这又须从战果来判断。因此，我们认为孙子的原意大体被曹操体察到了，那就是：凡能够正确制定并执行战略战术计划从而取得战争胜利的，就选留他，否则就打发他走。由此可见，赵注是深得孙子的真谛的。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

【简释】

计利以听 以通“已”。听：从，采纳。有利于克敌制胜的战争决策已经被采纳。

势 作动词用，创造态势。戚继光解释为在战争决策既定之后，为了迷惑敌方而采取的一些佯动措施。

以佐其外 外：相对于前面所说的“五（事）”、“（七）计”而言，“五（事）、（七）计”所决定的是内部的事，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而制造迷惑敌人的态势是必须外露的，而且只能起辅助作用。

【译文】

有利于克敌制胜的战争决策已被采纳，接着就创造一种态势，以作为辅助的外在条件。

【赵注】

“计”是在国内保密状态下进行的。“势”是故意表露在外的现象，是对于“计”的辅助措施。这是说，根据对“五（事）”的考察比较，知道对我方没有不利之处，物色选拔的诸将又都足以听任使用，但仅仅依仗“计划”和“将听”这两方面就贸然与敌人开战，只指望在刀来剑往中取胜，却又不行。还必须在外表上造成一种态势作为“（七）计”的辅佐。这三方面都具备了，然后才可以谈怎么去作战。大体上进攻没有什么良策，只有“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所以，造成某种态势，不过是为着欺骗对方而使敌判断失误。

【补说】

“势”其实就是一种策略，即故意采取某些行动，迷惑对方，使其来不及防备。这个策略由韩信在楚汉相争中灵活运用，后来人又将它总结为一条极为凝炼的成语：“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刘邦为了进军汉中（陕西），曾烧毁了从关中到汉中的栈道，以防止雍王章邯的侵袭并麻痹项羽。公元前206年，刘邦的大将韩信要出兵，为了迷惑敌人，佯装修复栈道，不待栈道修好，却暗中从故道（在今陕西凤县、甘肃两当县）迂回到陈仓（今陕西宝鸡县），击败了章邯，消灭了关中的雍王、塞王、翟王，占据了关中。制定暗中从陈仓出兵的计划是“计利”，是“内”，是真格的；公开派人修复已烧毁的栈道，是“为之势”，是“外”，是糊弄敌人的。

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简释】

制 从，根据。

权 权变，变化。

【译文】

所谓态势，就是根据有利的条件，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

【赵注】

这是阐明用“势”的原则。“权”，秤锤，是随着秤物的轻重而转移的；“势”是根据不同的有利条件而创造的，哪有什么固定的常规可言呢！

【补说】

战略决策已经确定之后，在具体执行中，仍须注意灵活机动，方能实现战略意图。公元前154年，西汉吴、楚等七个诸侯国联合反叛朝廷，汉景帝派周亚夫统兵讨伐。由于吴楚七国联军急于速胜，周亚夫便采取避免正面交锋以逐步削弱其锐气，并用小股部队袭扰其后方，阻断其粮道的策略，巧与周旋。吴楚军无法与政府军正面决战，便转而进

攻梁国。梁王求援，周亚夫却率军移往荥阳坚守，但阻断敌方粮道的计划仍顺利实施。不久，吴楚联军的粮道被阻断了，只得撤退。这时，周亚夫出动精兵，兼程进击，吴楚兵大败，吴王被杀。这一仗不单解了梁国的围，而且收复了许多失地。

周亚夫所执行的这个避开正面决战，阻断粮道，疲敌聚歼的作战策略是受命前与景帝当面决定的，但是在具体实施时却随机变化，尤其是在梁国被围，梁王直接向景帝求援，景帝命周亚夫出兵时，他仍为了保证阻断敌粮道的计划实施，采取大步退让的策略，体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

【简释】

诡道 诡，欺诈；诡道，欺诈伪装的方式方法。

【译文】

用兵作战，常采取欺诈佯动的方式。所以，实际上能打而对敌表现出不能打；

【赵注】

由此而下，阐述战争中采取欺诈佯动的方式的十二种情况。这是采取“计”以外的“势”，根据有利的条件而实施的战术。“能而示之不能”常有如下做法：收缩兵力退保营盘，主动撤离，大步后退，显示无正面作战的能力。倒下指挥旗、停敲进兵鼓，以显示已无力坚守；战士喧呼嚣叫，行阵混乱动摇，以显示将领已无力整肃军纪、统率全军；士卒疲惫倦怠、饥渴难忍，以显示部队已无追击的能力。

【引类——举例】

公元前200年，西汉高祖刘邦派使节出使匈奴，匈奴人把强兵壮马都隐蔽起来。使节归国后都说匈奴容易攻击。只有刘敬说：“两国相争，当以炫耀自己的实力，而我们看到的只是老兵瘦马，这肯定是匈奴故意示弱来麻痹我们，我认为匈奴已早作准备，万不可攻击。”汉王没有听从刘敬的意见，果然被围困在白登。这是匈奴故意“能而示之不能”。

公元前700年楚人攻击庸国，七次交锋都打了败仗。后庸人反击，楚人又一次大败，于是庸人认为楚人已不能与其作战，因而不再提防。这时楚王兵分两路，一举灭亡庸国。开始几仗是楚人“示人以不能”。南北朝陈朝大将侯安都为皇上陈霸先据守京都金陵，当齐军乘虚攻占石头城，游击骑兵一直到了皇城下时，侯安都倒下指挥旗向齐军示弱，并对城中军民下令：“有登上女墙瞭望敌人者，斩！”到了傍晚，齐军收兵回驻石头城，侯安都夜间命令士卒秘密准备好防御用具。第二天早晨，齐军又到，侯安都打开了东掖门与齐军作战，结果大败齐军。这是侯安都“示人以不能”，于危急中争得胜利。

用而示之不用，

【简释】

用 采取战斗行动。

【译文】

实际上即将采取战斗行动，但却显示出暂不进攻的样子；

【赵注】

已决定用骑兵车战，但做出用步兵作战的样子；已决定用“奇”兵侧袭，但做出正面进攻的样子；已决定用水攻，但做出用骑兵车战的样

子；已决定从陆路出击，但做出要使用战船从水路进攻的样子。

【引类——举例】

春秋末年，郑武公打算袭击胡人，却先把女儿嫁给胡王，过后不久召群臣议事，问：“我打算用兵，先攻击哪一个？”大夫关思其说可以攻胡，武公悻然大怒，说：“胡和我情同手足，你却说要攻击它，安何居心？”一气之下，杀了关思其。胡人听到消息，认为郑国是友好邻邦，因而对郑不加防备。郑武公派兵对胡大举进攻，不久就占领胡国。这是郑武公“示人以不用”的策略。

东汉明帝永平16年（公元73年）班超从于阗出发进攻莎车国，龟兹王率兵从东来援救，班超说：“现在我方兵力不足以应敌，不如假意把于阗兵解散，做出退兵的态势，我们佯装向东，长史假意西归，等到深夜闻鼓声起再出击。”于是放跑了掳得的牲口，以示撤退。龟兹王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亲自率领一万骑兵在西境拦截班超，并派温宿王率八千骑兵在东界阻截于阗的军队。班超得知敌兵已经分两路出动，就秘密召集各部，于鸡鸣时，奔袭莎车国兵营。莎车兵非常惊恐，只得归降。这是班超“示人以不用”，而出奇制胜。

东汉桓帝时，鲜卑人侵犯东汉边塞，段颖奉命领兵阻击，他担心鲜卑兵败后逃散不易全歼，就让驿马假传圣旨召段颖回朝，段颖就伪装退却，而在一路设下埋伏。鲜卑人信以为真，于是纵兵追击，进入段颖的伏击圈。段颖命令全军出击，全歼鲜卑兵。这就是段颖“示人以不用”，杀了个“回马枪”。

【补说】

赵本学的注解和他所引用的战例并不是对应吻合的。几个战例都是说，实际上要打仗，却故意显示不打；而注解却是介绍在兵种使用、

进攻方式上的“诡”道。但是，这两方面合在一起可以使孙子的“因而示之不用”得到充分的发挥。

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简释】

杜牧注：“打算攻击近敌，却一定作出远袭的态势；打算袭击远敌，却一定作出近攻的样子。”其目的在于迷惑敌人，使它丧失警惕，不加防备。

【译文】

目标在近处，却显示意在远方；着眼在远方，却故意表现出目标就在近旁。

【赵注】

远近，是针对空间地域说的，比如军队所处的地域，有溪涧无法渡过，就驻扎下来构筑营垒，大量砍伐树木，大批建造舟楫，扬言要立刻渡水，而在夜间却命令精兵秘密渡水以袭远。这是“远而示之近”。又如所处地形山势高峻不可逾越，那么主力部队一到这儿就回头，并扬言改变进军路线，但是却暗中命令精兵沿着小道，用悬钩悬索，一个接一个地攀山越岭。这就是“近而示之远。”

远近，又是针对时间来说的。比如有利于速战，反而构筑营房，做出作长期驻扎的样子，甚至遣返士兵回家种田，显示出非常悠闲和缓。当听说敌人因此而取消戒备时，立即昼夜兼程连续强行军，投入战斗。这就是“近而示之远”。又如时机明明只有利于持久作战，却反而紧急准备进攻的器械，大造声势，做出早晚即将进攻的态势，使敌方日夜处于紧张守备的状态，得不到休息，而我方却厉兵秣马，养精

蓄锐。当敌人因此而松懈斗志时，便偃旗息鼓，突然袭击。这就是“远而示之近”。

【引类——举例】

公元前205年，韩信早已打算袭击魏国，事先却在蒲坂集结大量军队，包围了临晋。韩信还不断地增设疑兵，排列船只，佯装渡水袭击临晋，而伏兵早已乘木罌从夏阳渡河直取安邑，俘虏了魏王豹。这是韩信采用“远而示之近”的谋略。

后燕慕容垂打算进军滑台讨伐驻守的丁零翟钊，却在黎阳津屯兵。翟钊原在南岸扼守，慕容垂移军西津，并特意制造百多艘牛皮船，载兵逆流而上。翟钊撤除在黎阳的防守，移兵扼守。慕容垂乘黎阳守备空虚，暗中派兵夜渡黎阳。翟钊闻讯回师救援，士兵疲于奔命，纷纷逃回滑台。翟钊带着妻室儿女和数百名骑兵，亡命直奔白鹿。慕容垂紧追不舍，俘虏了他的全部士兵。这是慕容垂“近而示之远”的策略。

北魏孝庄帝永安3年（公元530年）魏将贺拔岳在汧、渭二水之间讨伐鲜卑族起义军万俟丑奴所部。他向远近扬言：现在天气逐渐热了，不适合打仗，等到秋凉再说。丑奴听到这种传言，就把守军分散到岐州一带近百里的方圆内去自筹粮饷。贺拔岳一听到万俟丑奴的兵力已经分散，就秘密结集军队，趁黄昏时分，隐蔽地派遣快速骑兵先行阻断诸路交通，然后大军出动，于拂晓时包围了万俟丑奴，攻占了阵地，其他各处敌兵全部投降。这是贺拔岳“所攻之期在近而所示之期在远”的战例。

公元589年，隋朝大将贺若弼进攻陈朝。他的部队调防总要在历阳集中举行交接仪式，一时旌旗如林、营帐覆野，陈朝人以为大兵压境，调动全国兵马前来设防。以后知道对方是部队调防交接，久而久之，习

以为常，把士兵又分散到各地，不再设防。于是贺若弼渡江攻陈，而陈国竟没有人发现。这就是“出其不意，攻其无备”。

【补说】

赵本学列举四个战例从时空两个方面阐发了“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的内涵，实在是非常精当的。不仅是对孙子兵法合乎逻辑的解释，而且是发人之所未发。

利而诱之，

【译文】

敌人贪于战利，就用小利来引诱它。

【赵注】

调用老弱残兵作主力，使敌人认为有利速胜从而被诱出去；暴露大批的辎重让对方认为有利可图，从而被诱来攻；或让出有利地形诱敌深入；或显示我城防不固，而诱敌强攻；或让敌人小胜诱其骄纵、怠惰。

【引类——举例】

战国时，赵国大将李牧奉命镇守雁门关，以防匈奴入侵。他经常犒劳三军，却不准将士迎敌，他宣布：“如有匈奴前来骚扰，赶紧撤回城堡。违令者，斩！”匈奴人以为李牧怕他们，而边关将士受到赏赐，都跃跃欲试与匈奴决一死战。李牧故意大驱牛羊，一时人畜散满原野，匈奴兵毫不畏惧，前来掳掠。李牧佯败，并故意让匈奴俘虏数千名将士。匈奴更是肆无忌惮，举倾国之兵前来掳掠。李牧在多处设置骑兵方阵，张开两翼，大举攻击匈奴，打败了匈奴的十多万兵马。这是李牧“诱人以利”的策略。

隋朝炀帝11年，江都丞王世充率兵到盱眙讨伐孟让领导的起义军，他有意放风大批士卒叛逃，让敌方知道。孟让果然大笑道：“王世充只是一个起草文书法令的小吏，怎能担任大将，我一定要活捉他！”于是进攻王世充的军营。交战时，王世充佯装不能取胜，孟让更加轻视他，放纵士兵分散掳掠。王世充看准这个机会，命士兵捣毁锅灶，撤去帐篷，组织方阵，四面出击，大败孟让军队，只有孟让只身逃跑。这是王世充“诱人以利”的策略。

曹玮统率兵戍边，开战小胜，敌兵退走。曹玮侦察到敌兵已经走远了，就赶着夺得的牛羊，运着辎重，慢慢回撤，队伍很不齐整。他的部下们都很担心，对曹玮说：“牛羊赶回去没有什么大用，反而牵制了军队的行动，赶紧把队伍整顿好。”曹玮不回答，只派人侦察敌情。敌兵已走了几十里，听说曹玮贪图小利而使军队涣散，就立即回兵袭击。曹玮知道后，愈是命令部队放慢速度，直到了有利的地形才停下待敌。敌兵的主力逼近了，曹玮派人向敌军通报说：“你们从远路赶来，一定很疲惫，我不愿乘人之危，请先让兵马休息一下，然后选个时间决战。”敌兵正苦于疲惫不堪，听了都很高兴。等到敌军认认真真地休歇了好一会儿，曹玮才向敌军通报：“已经歇够了，应该开战了！”于是各自击鼓进兵。只一仗，曹玮就大败了敌军。然后丢掉了牛羊以整肃的行列回师。他慢悠悠地对部下说：“我知道敌人已经疲惫，就故意装作贪牛羊之利来引诱它。待它尾追而来，已行程将近百里。若乘敌气势正锐便交战，可能有胜有负。长途跋涉的人，如果稍微息一下，小腿会胀痛得不能站立，人的精神也会萎靡不振，我们就是因此而获胜的。”这就是曹玮的“诱人以利”。

【补说】

这几个战例都足以说明，制造假象，让敌方觉得有可以获胜的好机会，中计上钩，按我方意图行事，这确实是一个迷惑敌人从而战胜敌人的有效策略。

乱而取之，

【译文】

扰乱敌人，并乘乱去战胜它。

【赵注】

乱，扰乱敌人。多方派出间谍以破坏敌人的谋略；纵火烧敌方的营房，破坏营寨的栅栏，使其居寝不宁；出动快速的骑兵小分队纵横冲击来打乱敌方的兵阵；盗用对方的旗号，改变外在标志来扰乱敌营；与敌方穿同样的军服，打同样的旗帜，扰乱敌兵的视听，从而乘敌混乱去战而胜之。

【引类——举例】

春秋时代，吴国人进攻州来，楚国统帅胡、沈、陈、顿、许、蔡七国军队前来救援。公子光说：“七国一起作战，并非同心同德，楚军可以击败。如果我们先分兵攻击，胡、沈、陈三国必败。三国败势已定，诸侯必然动摇，加之内部不和，必然失败。让先遣部队去掉装备，减小威势，让后续部队负责督阵整顿军阵，待命进击。”吴王采纳这个意见，在鸡父展开激烈的战斗。吴王用三千囚犯作先头部队进攻胡、沈、陈三国部队，囚犯不熟战法，三国士兵争相攻打他们。吴国的囚犯冲冲停停，三国军队被搅乱了。吴国军队乘机出击，三国军队大败，国君和大夫被俘。吴国只放走胡、沈两国俘虏，让他们逃至蔡、许、顿三国军队那里说：“我国君已战死！”吴国的军队紧随俘

虏后面，大声呐喊，鼓噪而进，蔡、许、顿三国军队闻风而逃，楚军终于被击败。

【补说】

“乱”，有制造敌方的混乱，比如乱其军心，乱其阵脚；有利用敌方的混乱，比如敌方军心不稳，阵脚紊乱。目的在于“乱”中取胜。后秦苻坚与东晋谢玄的淝水之战是一个“乱而取之”的好战例。谢玄要求苻坚稍向后退，让晋军渡过淝水决战，苻坚企图乘其半渡而击之，就答应了对方的要求。谁知部队一后撤就陷于混乱，同时，秦兵有半数以上的士兵厌战，有的还害怕晋军，军心有些不稳。而身在秦军心在东晋的朱序利用这种情绪，趁秦军后撤时，在阵后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果然大乱，晋军乘乱猛攻，大获全胜。这个利用混乱再制造混乱的乱中取胜的策略，极大地扭转了战争形势，从而使东晋能以弱取胜、以少胜多。

实而备之，

【译文】

敌人实力充足，须严加戒备。

【赵注】

敌人内部组织严密、军容整肃、法令严明，战士精神饱满、人员精干、军粮丰足，没有战而胜之的可趁之机。这是敌人的“实力”足。遇到这样的敌人，应该自加小心，须谨慎地掌握敌方动态，派人深入敌方进行侦察；须加强自己的防御，加固阵地；须关心爱护自己的士兵，使他们精诚团结，精力旺盛；须严密提防敌人的间谍活动，时时

处处提高警惕，如同大敌当前，严阵以待，决不能有一时一刻、一丝一毫的松懈麻痹。

【引类——举例】

东汉初年，邓禹随刘秀镇压农民起义军，在进入函谷关以后，将领们都建议直接进攻长安，邓禹说：“不行，我们的兵虽多，但是能作战的少，又没有可靠的军需，没有随军运输的粮饷。而赤眉军刚打下长安，粮食物资都非常充足，其锐利的锋芒是我们阻挡不了的。但是这伙强盗虽聚集在长安，却没有长远的打算，眼下粮食财物虽多，但是内部变故也非常多，哪能够长期坚守？上郡、北地、安定这三个郡，地广人稀、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我们暂且北上，避免决战，接近粮产地以休养士卒。只有发现了敌人的弱点和失误，找到有利战机，才有可能战胜它。”这说明邓禹懂得“备”人之“实”。

春秋时代，楚国人进攻陈国，吴国去救援，军队行到了距楚军三十里的地方，遇上了接连十天十夜的大雨。楚国的左史倚相对大将子期说：“下了十天十夜的大雨，兵马都集中在一起，吴军必定会乘机进攻，应当作些准备。”于是列兵排阵。吴军果然来了，但见到楚军已有准备，又撤回去。倚相又对子期说：“吴军往返要走六十里，回到原地后，将官们要休息，士兵们也要忙吃的。我们乘机行军三十里去袭击它，必能战胜。”子期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打败了吴军。这就是楚人有“备”而保全了自己，吴人无“备”而打了败仗。

【补说】

对于“实而备之”的理解，如果只限于“敌方如果实力充足，须加以戒备”是不够的。因为这里讲的是“诡道”，是变着法儿去“整”敌人的，目的在于克敌制胜。因此，即使我们战斗力很强也要提高警

惕，以防万一之失。赵本学的两个例子侧重于备，可能就是从这方面着眼的。

强而避之，

【译文】

对于战斗力强而又士气旺盛的军队，先得避开其锐气。

【赵注】

百战之后，声威显赫、乘胜远征的军队，锋芒是锐不可挡的，这就是敌方的“强”。遇到这样的敌人，宜于整顿军队，集中兵力，据险固守，并用强弓硬弩严加防御；或修筑城堡营寨，实行坚壁清野，等敌人军粮耗尽，发生饥荒。一等到敌军士气衰竭、战斗力削弱或全军饥饿、无心战斗，就安排“奇兵”主动寻机作战，而决不能坐以待敌，轻易决战。

【引类——举例】

唐初大将李孝恭讨伐在江都称帝的萧铣的时候，萧铣命文士弘为将，他率领数万精锐士兵驻守清江。孝恭预备进攻，李靖说：“文士弘是员健将，士兵又都很骁勇，最近刚失荆州，现在动员全部兵力投入作战，这是一支挽救败局的军队，我们恐怕是抵挡不了的，不如暂时在南岸驻守，不与其交战，等到他的士气衰弱，再发动猛攻，就一定能够打败他。”孝恭不采纳这个意见，自率军队与文士弘作战，果然兵败，又逃回南岸。这是孝恭不懂得“强而避之”而失败的战例。

【补说】

“强”是相对的。一支“救败”之兵也会有难以估计的战斗力的，形成暂时的“强”。孙子说：“穷寇勿追”，恐怕也是要避开其“狗急跳

墙”式的“强”吧。因此，我们对于“强”的分析须因时、因地，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切不可重犯孝恭的错误：只见到文士弘是败兵，是“弱”者，看不到这是一支为了生存而可能殊死拼搏的“哀兵”，是“强”者。

怒而挠之，

【译文】

对易于激怒的军队（的主帅），要设法去刺激他。

【赵注】

怒，刺激他使他发怒。挠，意思是阻挠他实施其作战计划。或者是派人用轻蔑的语言去嘲弄讥诮；或者借助派来的使节传递污辱性的言辞；或者关闭营门表示对敌方的轻视；或者放肆进攻欺他无能。对方禁不住怒火，必然轻率地交战。本句所述是由于敌将沉着稳重，再三相约也不出战，而想采用更高明的谋略来拖住我方，故而采用的这种策略。另有一种说法：敌将容易发怒，可以根据这一性格特点来挫败他，阻挠他的作战计划实施，这也是一个方法。

【引类——举例】

唐初宋老生屯军霍邑，李渊欲使他出战，担心他不肯出兵。李世民说：“宋老生勇而无谋，用小股骑兵挑逗他，照理他会出战的。等他脱离固守的营地，就扬言说他已背叛朝廷，归附于我们。他一定怕人上奏朝廷，落个叛逆罪，怎会不与我们交战呢？”于是李渊率数百名骑兵，先到离霍邑城东数里处等待步兵，又派李建成、李世民率领数十名骑兵，到霍邑城下。他们举着马鞭，指东画西，象是要包围霍邑，又大骂宋老生。宋老生被激怒了，就率领三万兵马，分路出击。

李渊招引后续部队正准备吃饭，李世民说：“机不可失，不吃饭也要同宋老生作战！”李渊和李建成在城北布阵，李世民在城南布阵，李建成兵少撤下来，李世民率领骑兵向前猛冲，直冲到宋老生的背后，活捉了他。

【补说】

“怒而挠之”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敌将易怒，我们就根据这个特点设法刺激他，使他丧失冷静，从而阻挠他战斗方案的顺利实施，达到击败他的目的；其二，设法激怒对方主帅，从而按照自己的预定方针去打败他。

宋老生勇而无谋，是个易被激怒而上当的主帅，李世民才能达到“怒而挠之”的目的。其实历史上这类例子很多，宋老生就是没有以史为鉴。公元前204年，刘邦与项羽在成皋一带作战，项羽为解除对后方的威胁，率主力去睢阳开辟新战场，留下曹咎防守成皋。项羽叮嘱再三：“谨守成皋，刘邦来挑战，你决不能出兵！”可是曹咎终究顶不住刘邦军士们的连日辱骂，带着雷霆之怒出城应战，结果在军队尚未完全渡过汜水河时就遭到刘邦的攻击，全军被歼。这是一个用激怒对手而阻挠其作战方针顺利实施的例子。

卑而骄之，

【译文】

故意自卑自贱，从而造成敌人的骄纵。

【赵注】

故意让自己处在卑微屈辱的地位，从而让敌人骄纵之心得以满足。敌人有什么企图与要求，我姑且先满足他；敌人谩骂污辱，我姑且忍

受；敌人挑战，我暂先退却避让。有时以夸张的词语来奉承对方，有时以馈赠财物来结交敌手。敌有骄纵傲慢之心，就不会介意我们。这是在敌方畏惧决战而采取固守策略时，我方想决战决胜却没有适当的机会时就可采用这个方法。

【引类——举例】

公元前200年匈奴冒顿单于刚即位时，东胡实力正强，他们派使者向冒顿索要千里马。冒顿询问群臣，都说：“千里马是国宝，不能给！”冒顿说：“结交友好邻邦，怎舍不得一匹马呢？”于是将马送给东胡。不久东胡又派使者，点名要阏氏（冒顿的妻子）。冒顿又问群臣，都火冒三丈说：“东胡太无道理，居然来要我们的阏氏”。冒顿说：“交好邦邻，怎能舍不得一个女人呢？”也将阏氏送给东胡。又不久，东胡又说：你们有一千多里的荒地，我们想要。冒顿召群臣商议，有人说“照给不误”，冒顿大发雷霆：“土地是立国的根本，为什么要给他！”下令杀掉主张割让土地的人，亲自披挂上马，下令说：“军中有拖延上阵者，斩！”于是率军直奔东胡。东胡人一向轻视冒顿，不加防备，终于被冒顿消灭。这是冒顿“卑而骄之”的策略。

【补说】

无论是在敌人鄙视我们时，我们愈须设法使他骄纵，还是我们采用自卑自贱的方法来使敌人自骄自纵起来，都含一个道理：骄兵必败。冒顿的策略就是两者兼而用之，终于使对手丧失警惕，这也是“能而示之不能，强而示之弱”。

佚而劳之，

【译文】

对处在有利地位休整安逸的敌人，须设法骚扰它，使其劳累疲惫。

【赵注】

以利为饵，引诱敌方疲于奔命，设法使敌方某一部受创而全军忙于救援，作出进攻的态势使敌方处于紧张戒备的状态，让他疲惫不堪，叫他不得安定。

【引类——举例】

唐代天宝年间，史思明叛乱，郭子仪、李光弼进攻他。郭子仪挖深沟、筑高垒以待敌，敌来就坚守，敌去就追击。白天作出进攻的态势，夜晚就袭扰敌人的营寨，叫它日夜不能休息。连续几天后，郭子仪、李光弼商量说：“敌兵已经疲惫，可以出击了！”于是在嘉山展开激战，大破敌军。这是郭子仪的“劳人”战术。

春秋时代吴国进攻楚国。公子光向伍子胥问计，伍子胥回答：可以分成三个梯队与他轮番作战。我们的每一梯队到，楚人都必定倾巢出击，等到他一出击，我便撤回。我军轮着进攻，就可以拖疲他，造成他判断失误。然后我们三个梯队一起上，必定能够大获全胜。公子光听取了这个建议，大败楚国。这就是公子光听取了伍子胥的“劳人”战术，取得了胜利。

【补说】

赵本学对这个战例叙述不够准确。据《左传·鲁昭公三十年、鲁定公四年》记载：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准备大举攻楚，孙武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加以劝阻。吴王就根据伍子胥的建议，把吴军分为三军，轮番袭扰楚军。连续六年忽南忽北地袭扰楚国的边境，使楚军疲于奔命，为公元前506年破楚都城郢创造了条件。这个战例说明长期反复袭

扰才能达到“劳人”的目的。孙武当时在吴为军师，当然知道这件事，也必然用以充实他的军事理论。

亲而离之。

【译文】

敌人内部团结，则设法离间他们。

【赵注】

派遣奸细说客、编造谗言谎话来设法离间对方的君臣关系，瓦解他的外交同盟和援兵，使他的将吏叛变、谋臣离散，让他的内部互相攻讦，政令无法统一。

【引类——举例】

西汉更始帝（公元23—25年在位）刘玄派遣李轶、朱鲔率兵讨伐燕赵等地。冯异给李轶写了封信，劝他归附光武刘秀。李轶回信说：“愿献愚策以助萧王”。冯异奏闻光武，光武就把李轶的这层意思公布出来，故意让朱鲔知道。朱鲔知道后，派人刺杀了李轶。因此发生朱、李内乱，城中守卒多投降光武。这就是光武帝采用“离人”策略以胜敌。

【补说】

广义地说，离间敌方的同盟军也属“亲而离之”的范畴。战国时，秦最大的敌手是齐与楚，更害怕齐楚之间的联合，所以张仪的全部外交活动都服务于这个战略目的，这就是针对“合纵”的“连横”。张仪的努力是成功的，齐楚断交，楚随之灭亡。楚之以后不多年齐也因孤立无援而被秦灭亡。秦统一六国过程中各个击破策略的成功实施，很

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外交上的“亲而离之”，何况六国之间还是一种松散形的联合，离间极易见效呢。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译文】

进攻要乘敌人没有防备，出击应选择敌人意想不到的时机。

【赵注】

采用十二种方式方法对敌人实施“诡道”，进行欺诈，使敌料不到我会出击，疏于提防，从而给我以可乘之机，对他则有猝不及防的祸患。我出兵神速，全面进攻，使敌军心震慑，易被击溃。敌于仓猝之间难以估计我兵力，也无法迅速采取对策，兵员不能迅速结集，兵阵不能及时整顿，即使有猛将锐卒也无能为力。唐太宗说过：“（兵法）有千句万句，但都不外乎想方设法使敌人失误这一句”，正是体现了孙子这个意思。

【引类——举例】

梁太祖朱全忠（公元907—912年在位）讨伐泽州叛将丁会，晋王派周德威前去救援，两军相持不下。不久晋王李克用死了，庄宗李存勖召周德威回太原。梁太祖听说晋正在办丧事，周德威已经撤离前线，于是也回到洛阳。诸将们也稍稍松弛下来。庄宗对周德威说：“晋人所以能敌梁，梁所以惧晋，那是因为有先王在。现在先王已故，我又是刚登王位，梁国一定认为我不会出兵，思想必然松懈，我们应该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这不仅解除泽州之围，还可以奠定霸业的基础”。庄宗与周德威策马急行六天，到了北黄碾。正巧天下大雾，日色昏暗，就在三垂冈设下伏兵，而主力直扑泽州，打败了梁军卢怀英

部，卢怀英弃城逃走。这就是周德威以“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战略取胜。

三国初期刘勋治理皖城，依仗兵多将众，横行于江淮之间，无可匹敌。孙策虽对他非常怨恨，却派人送去丰厚的财礼，并用卑谦的言辞去劝他进攻海昏上缭国。使者说：“上缭国多次欺侮我小国，对我加害多年，我欲报复，行军不方便，希望能借重将军的神威。此外，上缭国国富粮足、仓廩殷实；吴越美女充塞王宫；夜明珠和奇珍异宝收藏极多，夺取了可以资助军用。我孙策愿意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并亲率士卒，以作后援。”刘勋答应了。刘晔劝谏道：“上缭虽是个小国，但是城墙坚固、护城河极深，易守难攻；况且我军在国外作战易被拖垮，国内粮草会逐渐空虚。孙策多谋略，善用兵，如果乘虚袭击，我们拿什么防御？再说，如果进军失利，怎样退兵？落到羝羊触藩、进退两难的地步，岂不后悔莫及？”刘勋不予采纳，却大举兴兵，进攻上缭国。孙策果然乘机袭击庐江，刘勋逼得无路可走，就投奔了曹操。这就是孙策的“出其不意，攻其无备”。

【补说】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本质上就是善于捕捉并运用战机从而克敌制胜。“无备”与“不意”不是靠臆测、不是用估计、不是以“合理”的想象，而必须通过侦察调查，充分了解敌情，尤须了解敌方的主将与决策人物，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作出谨慎的判断，抓住战机。一切以意为知、主观臆断都只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简释】

胜 指克敌制胜的秘诀。

传 使它传开来，即让它泄露出去。

【译文】

诡道十二法是战争指挥者的克敌制胜的诀窍与奥秘，具体实施计划是不能事先向外传开的。

【赵注】

乘虚袭击敌人的诡道诸法，是指挥员夺取全胜的诀窍，最应该隐秘，不能事先泄露出去，否则敌人就会有所准备，或及早采取对应措施，或反过来攻我无备，袭击我防守薄弱的地方。许洞说“袭其不意”是重复说明“攻其无备”的道理。这是孙子反复强调的观点。

【补说】

“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作用极为重大，其具体实施的细节须绝对严守机密，否则将全功尽弃，且后果不堪设想。孙子在《用间篇》中对这种保密工作是有所阐述的。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简释】

庙 古代君主祭祀祖先、与群臣商量国家大事的地方。

算 计数，古代作战前，在“庙”中谋划策略预卜胜负，叫“庙算”；而预卜胜负是从对双方的“五（事）”、“（七）计”进行逐项考察来确定的。每一个方面就是一个“算”——判定胜负的条件。多算，即占优势的条件多；少算，即占劣势的条件多。

见 现，显示。

【译文】

战前进行谋划，预计可以获胜，是因为分析结果有利条件占多。战前进行谋划，预计不能获胜，是因为分析结果有利条件占少。有利条件多者可以获胜，有利条件少者则不能获胜，更何况是没有有利条件呢？根据这些来考察，胜负就显而易见了。

【赵注】

古代进行战争，必定先在庙堂中分析谋划，作出预见，然后才出兵，所以最初的作战分析叫做“庙算”。所谓“庙算”先有胜过敌方的策略，是由于计画周详，作战优势多；先无胜过敌方的策略，是由于计画不周，作战优势少。筹划周密，策略就好；筹划不周，策略就差；完全不作谋划的就更不用说了。孙子还说：“我们根据这些来考察，胜负就显而易见了”，这是总结上文。

我认为古代良将，全才的少，凭着较少的军事艺术去战胜几乎不学无术的多。只有在三国时代，君臣上下都表现出高明的才干，他们分析考虑问题几乎没有疏漏，因此想只凭实力作战或凭诡诈取胜是行不通的。他们之间的胜负，仅仅根据对分析有利条件的极细微的差别来决定的。譬如下围棋，对手偶然错失一着，就失掉一局，这是免不了的。假如三国中有一方“愚”，那就会形成半分天下的局面，有两方“愚”，那第三方就足以统一天下，不会等到晋朝才统一了。唉，诸葛亮也确实难啊！

【补说】

“计”是战前的分析考虑，谋略策划，从“五（事）、（七）计”到“诡道”十二事，从战争的决策到具体的战术实施，作了提纲挈领的阐述。以下许多篇都是“计篇”内容的具体化和系列化的说明。

“计”是在对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作客观的分析，从而形成战役决心、战略意图、战争决策的过程，是一个能动的认识过程。

“计”的结果是对敌我双方矛盾诸因素的分析中，引出对战争结果的预测，即判定在胜与负这对根本的矛盾中，谁是主要方面。因此

“计”的过程也是一个辩证思维的过程。

“计”是战争的第一步，是孙子兵法的第一个基本点。数千年的战争史检验、补充并完善、发展着它。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思维对于存在的能动作用的理论更有助于我们认识《孙子兵法》难以估量的作用和意义。